

THE NEW YORK TIMES BESTSELLER

BARACK OBAMA

巴拉克·奥巴马 著

无畏的希望

The
AUDACITY
of
HOPE

重申美国梦

THOUGHTS ON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

奥巴马自传 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第一名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罗选民 王璟 尹音/译 罗选民/校

The
AUDACITY
of
HOPE

无畏的希望

*Thoughts on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

重申美国梦

BARACK OBAMA

[美] 巴拉克·奥巴马 著

罗选民 王璟 尹音 译 罗选民 校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畏的希望:重申美国梦/(美)奥巴马(Obama, B.)
著;罗选民,王璟,尹音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8.8

书名原文:The Audacity of Hope;thoughts on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

ISBN 978 - 7 - 5036 - 8690 - 0

I. 无… II. ①奥…②罗…③王…④尹… III. 奥巴马,B. —
自传 IV. K837.1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4164 号

© 法律出版社·中国

无畏的希望:重申美国梦

[美]巴拉克·奥巴马/著

罗选民 王璟 尹音/译

罗选民/校

编辑统筹 大众法律出版分社

策划编辑 韩满春

责任编辑 韩满春

装帧设计 乔智炜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世纪千禧印刷(北京)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沙磊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

字数 263

版本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

网址/www.lawpress.com.cn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书号:ISBN 978 - 7 - 5036 - 8690 - 0

定价:42.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The Audacity of Hope, Thoughts on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

Copyright © 2006 by Barack Obama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Crown Publishers, an imprint of the
Crown Publishing Group,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www.crownpublishing.com

Crown is a trademark and the Crown colophon is a registered
trademark of Random House, Inc.

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rown Publisher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本书由皇冠出版集团授权法律出版社翻译出版。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08-2664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 9

第二章 价值观 33

第三章 我们的宪法 51

第四章 政治 73

第五章 机遇 97

第六章 信仰 133

第七章 种族 155

第八章 外面的世界 185

第九章 家庭 223

尾声 243

致谢 251

索引 253

序 言

从我开始参加政界竞选,至今已近十年。那时,我才三十五岁,从哈佛法学院刚毕业四年就结了婚,迫不及待地开始了新的生活。正好伊利诺伊州立法委员会有个空位,一些朋友就建议我去竞选。他们觉得我作为一名民权事务律师,又是社区负责人,社交广泛,候选人的位子唾手可得。和妻子商量后,我参加了竞选。像所有第一次参加竞选的人一样,我不放弃任何一次谈话的机会。我去过街区俱乐部的集会,参加教会活动,还去过美容院和理发店。如果见到街头拐角有两位交谈的人,我便会走过马路,递给他们竞选宣传册。无论我到哪里,我常常会遇到类似的两个提问。

“你这滑稽的名字哪儿来的?”

接着又是:“看起来你挺不错嘛,为什么要趟政治这滩浑水?”

对这个问题我丝毫不感到陌生。早在几年前我刚到芝加哥,在一个低收入社区工作时就遇到过类似问题。这不仅是对政界的嘲讽,还是对公共生活的挖苦。助长这种愤世嫉俗心态的是那些屡见不鲜的廉价承诺和空头支票——至少在我想代表的南部地区是这样。我常笑着点头回答,我能理解这种怀疑的态度,但不能否认,曾经并且一直以来都存在另外一种政治传承,它贯穿了从建国之初到民权运动的辉煌时期;它基于一个单纯的信念——我们彼此之间攸息相关;它令我们彼此之间团结压倒分裂。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民信仰这个传统并付之行动,即使我们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也终归会有所作为。

我想,我的演说是很有说服力的。尽管我不清楚那些听众是否也这么想,但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很欣赏我的诚挚和青年壮志,所以我成功地进入了伊利诺伊州议会。

六年后,当我决定竞选联邦参议员时,对自己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一切迹象显示我的事业选择似乎是明智的。我在少数党为任两期后，民主党最终掌控了州参议院。随后，我通过了包括从伊利诺伊州死刑制度改革到开展州儿童健康计划的许多法案。我一直坚持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书，我喜欢这个工作，常常会有人邀请我做巡回演讲。我保持了独立、奠定了声誉、稳固了婚姻，可这一切在我踏进首府华盛顿时——至少从统计上看——都面临着风险。

3 过往的日子都是有代价的，我想其中一些代价是随着人慢慢变老而来的。留心的人会发现，年复一年只会让人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全部缺点，那是一些盲点，是一些反复出现的思维定势，它可能是先天的，也可能是后天的，而时光的推移几乎注定了这一切只能每况愈下。蹒跚走路必然会引起股痛，道理如出一辙。在我身上，有个缺点一直让我心神不定：即便工作一帆风顺，即便恩惠近在咫尺，我都缺乏欣赏之心。这是现代生活的通病，我想，这也是美利坚民族性格中的通病，这一点在政界再明显不过了。但谁也讲不清到底是政治本身鼓励这个特性，或只是吸引了那些具有这种特性的人。曾经有人说过，人不是完其父愿，就是缮其父过，我想这倒可以用来解释我的缺点或其他东西。

不管怎样，我正是在这种不安稳的心态下决定参加 2000 年的选举，挑战一位在职民主党的国会席位。那是一次考虑欠周的竞选，我铩羽而归。我从这一惨痛失败中醒悟到，生活有许多不确定性，不可能一切都按计划实行。一年半后，失败的创伤已经痊愈。2001 年 9 月下旬的一天，我和一位传媒顾问共进午餐，他此前一直鼓励我再次竞选国家职位。

“你已经意识到政局变了，对不对？”他一边用指尖拨弄沙拉，一边问道。

“什么意思？”我明知故问。两个人都低头注视他身旁的报纸，上面头版就是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

“真够糟糕的，不是吗？”他摇着头说，“真是不幸。当然，你没法改名字了，否则投票者会怀疑的，要是你的事业刚刚起步就好了，你也知道的，这样你就可以用个别名什么的，但是现在……”他的声音渐渐弱下去，抱歉地耸了耸肩，之后示意服务生买单。

4 我怀疑他是对的，而这种想法疯狂地吞噬着我。看到那些年轻的政治家在我跌倒的地方超越我，荣升到更高层的职位，更加有所作为，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忌妒的滋味。政界的乐趣——激动不已的辩论、热情洋溢的握

手、蜂拥而至的人群——这些画面开始褪色。而工作中的琐事却让我越来越烦心：对金钱的乞求，宴会结束后路上又超出两小时的驾车，难以下咽的食物，令人窒息的空气，与妻子通话的只言片语。尽管她至今一直陪伴在我身旁，但她对独自照管孩子的日子感到失望，也开始质问我生活的孰重孰轻。连那些曾经放在首位的立法和制定政策的工作，我也开始觉得不着边际，离那些全国性的大事——税收、安全、保健、就业等相距甚远。我开始怀疑自己所选的道路，我开始觉得自己和想象里的那些演员、运动员一样，多年来为了追寻某一梦想，埋没于小小的舞台，或守候在替补席，到头来发现自己的才赋和命运已经穷途末路。梦想永远不会实现，现在他不得不面临选择：是成熟一些去接受现实并开始明智的追求，还是拒绝接受真相，在惨淡度日、终日吵闹不休中含恨终生？

否定、愤怒、交涉、绝望——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经历了心理专家划分的所有阶段。在某一点上，我接受了缺少天时地利这一事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认命了。我又回到州参议院工作，对于自己权责之内的改革和动议权感到心满意足。我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家里，看着女儿们长大，好好地珍惜妻子，策划今后如何挣钱。我锻炼身体，读小说，开始欣赏日月交运、四季更替，生活对我没有任何压力。

我想正是这种坦然接受的心态让我有了竞选联邦参议员这个惊人的想法。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我跟妻子这样说，在我获得一个更安稳、更高薪的工作以前，这是我的最后一次机会。或许出于同情之心而不是信服，她居然同意了。但她同样暗示我，她更喜欢的是那种有条不紊的家庭生活，否则，我就不用指望她的支持。

我不想让她为我长期的艰难处境操心。现在职共和党人彼得·菲茨杰拉德(Peter Fitzgerald)曾耗去1900万美金的家产让前任议员卡罗尔·莫斯利·布劳恩(Carol Moseley Braun)下了台。其实他并不十分知名，也不是那么喜欢政治，但是他家财万贯，加上他为人还诚实，这让他赢得选民们的一些尊敬。

在新西兰做了一段时间大使后，卡罗尔·莫斯利·布劳恩曾一度复出，试图收回州议员的宝座。她的成功几率很大，所以我只好将我的计划搁下。没想到她却决定竞选总统，这让其他所有人都开始把目光转向参议员竞选。

等到菲茨杰拉德宣布放弃竞选连任时,我面前主要有六位竞争对手,其中包括在任州财务司长、一位身价上亿的商人、芝加哥市长理查德·戴利(Richard Daley)的前任首席参谋,以及一位女黑人保健专家,光她手里那笔可观的财产,就足以分裂黑人的选票,令我仅存的希望毁于一旦。

6 可我不在乎。没有奢望之忧,凭借几份有效签注给我带来的信誉,我全身心地投入到竞选当中,找回了以为失去了的激情和快乐。我雇了四个机灵的助手,都是二三十岁出头,薪酬也不算太高。我们找了一个小办公室,印制了信笺抬头,装上了电话和几台电脑。我每天给民主党主要捐赠人打四五个小时的电话,试图得到他们的回复。我召开过记者招待会,却没有一个观众。我们签约参加一年一度的圣帕特里克节(St. Patrick's Day)游行活动,却被安排到游行队伍的最后。我和十位志愿者只能朝滞留在路边稀稀拉拉的几个观众挥手,并且发现身后几步远就是城市清洁车,工人们正在清理垃圾和路灯柱上的绿色三叶草贴纸。

然而,大多数时候我都是独自驾车游说的,首先从芝加哥的一个个选举区,再到各县各镇,最后跑遍了整个州。路过大片的玉米地和豆子地,火车轨道和贮料仓。整个过程举步维艰:没有州民主党组织机构的支持,没有一份像样的邮件联络名单,更没有好好地利用网络优势。我只能靠朋友和熟人关系去敲开每一扇陌生的大门,或把拜访安排在教堂、工会大厅、桥牌小组或“扶轮社”(Rotary Club)这些地方。有时赶了几小时路程后,发现只有两三个人围坐在餐桌旁等我。这时我还得让主人别介意到场人数,而且少不了把他们准备的点心赞美一番。有时候我会坐等到教堂的礼拜仪式结束,而牧师却把我发言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有时,地方工会领袖同意我给工会会员讲话,紧接着就宣布工会支持其他候选人的决定。

7 不论在北岸那些轩昂气派的豪宅,还是西区那些靠楼梯上下的楼房,抑或是布鲁明顿(Bloomington)郊区的农家,不论对方是两个人还是五十个人,也不论对方是友善还是冷漠,或者偶尔还会带有敌意,我尽量做到少言多听。我聆听他们谈论自己的工作和生意、当地的学校;他们对布什的怒气,还有对民主党的不满;甚至谈论他们的狗和自己的背痛,他们参加的战役以及儿时的记忆。有的人在谈起昂贵的医疗保险费和锐减的就业机会时振振有词,有的人重复着他们从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或公共电台听来的消息。但大多数人都忙于工作或照顾孩子,无心过问政治。他们讲的都是

眼前的事：倒闭的工厂，升职的机会，高额的供暖账单，养老院里的单亲和幼童的早期教育。

连月以来的谈话让我有所感悟。如果说，那就是我发现原来人们的希望竟是如此朴实。一致的信念是没有种族、地区、宗教和阶级之分的。他们大多数人认为，只要一个人想工作，就应该可以找到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人们不应该因为生病就必须去申报破产；每个孩子都应该得到真正的教育——这不应该只停留在嘴上；穷人的孩子也应该能上大学。他们想要远离罪犯和恐怖分子的安全感，想要清新的空气和纯净的水，想要有更多陪孩子的时间。他们想在年老时能够体面地退休并受人尊敬。

他们想要的就只有这么多。这算什么。尽管他们知道，自己的人生主要靠自己奋斗，也并不指望政府能解决他们所有问题，当然更不想看到他们的纳税被滥用，但还是觉得政府应该提供一些帮助。

我告诉他们说，他们是对的。政府不可能解决他们的全部问题，但只要政策稍有倾斜，全国上下一起努力，就可以保证每个孩子都有机会过体面的生活。听到这，人们更多会点头同意，并询问参与的办法。当我又上路时，副驾驶座上摆着一张地图，我驶向下一个目标，我此时再次明白了自己当初从政的原因。

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力量。

这本书直接取材于竞选一路上的谈话。从与选民的对话中，我看到了8美利坚民族的道德规范，我更加意识到，正是这些人的理想贯穿了美国历史，并不断鞭策着我们的集体正义感；正是共同的价值观让我们求大同而存小异；也正是这一脉相承的希望鼓舞着我们的民主政治不断开拓进取。这些价值观和理想不仅仅是刻在大理石纪念碑上，或者在历史书的背诵中，它们更多地存活于大多数美国人的内心，并感召着我们的自豪感、责任心和献身精神。

我知道这么说的风险有多大。在这个全球化和科技风云变化的时代，在这个充满残酷的政治战争和文化持久战的年代，我们连一种畅谈理想的共同语言都没有，更不用说让全民族达成一致去致力于理想的实现了。我们大多数人都清楚那些广告商、民意调查者、演讲撰稿人和评论家所玩弄的把戏，知道他们嘴里的那些浮夸字眼无非是为了冷嘲热讽，而真正高尚的情

操却毁于权力、谋私、贪婪或偏执的名下。甚至连标准的中学历史课本上都开宗明义地道出美国现实生活与美国神话有很大的出入。在这样的大气候下,任何坚持共同理想或价值观的主张,经常用来掩盖政策和执行上的严重分歧,或者更坏到用来捂住那些不满当前制度体系的抱怨之口。这样的主张即便不是危险重重,也是幼稚透顶。

然而,我的观点是——我们别无选择。我们不需要搞一次民意调查来确信大多数美国人——共和党人、民主党人、无党派人士——已经厌烦充满利益纷争的政治死局,厌恶少数派在意识形态领域强加自己的“绝对真理”。不管来自“红州”还是“蓝州”,我们都深感政治辩论中缺少诚实、严肃和常识,都憎恶看似依旧虚伪狭隘的选择菜单。不管信仰宗教与否,不管肤色是黑是白或棕色,我们都真正地意识到了,这个国家的首要任务正在被忽视。如果不尽快调转航向,我们会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把由强变弱的美国留给后人的一代。或许在美国近代史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种新的政治,它能够唤醒我们的相互理解,并在此基础上,团结整个美利坚民族。

这就是本书的主题:我们怎么开始去改变我们的政治和民生?并不是说我清楚怎么做。我也不知道如何去做。尽管我在每章都讨论了许多迫在眉睫的政治危机,并粗略地给出了一些可行的个人建议,但我的解决方法也经常是片面不完整的。我并没有在此给美国政府提供一个统一的理论,这些书页也没有提出一个行动宣言,没有配备完整的图表、时间表以及“十项方针”的行动纲领。

恰恰相反,我这里所说的是一些更朴素的东西:自省引导我走向公共生活的价值观和理想,反思当今政治话语中无益地制造对立的伎俩。当然,还有从我自己作为参议员和律师,丈夫和父亲,基督徒和怀疑论者的个人经历出发,基于追求共同利益的理念,给出我认为构建政治的最佳方法。

本书的结构体系安排如下:第一章盘点了美国近代政治史,并试图探源当今激烈的党派偏见;第二章讨论了新的民众政治赖以建立的共同价值观基础;第三章探究了宪法不仅是个人权利的源头,同时它还是组织民主对话、探讨共同未来的工具;第四章讲述了一些包括金钱、媒体、利益集团及立法程序在内的体制因素带来的负面影响,连那些抱负远大的政治家都难逃一劫;剩下的五章就如何跨越分歧,有效解决实际问题给出了意见。这些问题包括:许多美国家庭面临的日益增长的经济风险,国内种族和宗

教紧张局势,聚集在美国周边虎视眈眈的跨国威胁,如恐怖主义和流行病等。

我猜一些读者会发现上述问题的讨论有些比例失调,对于这一点,我供认不讳。毕竟我是一位民主党人,我对大多数话题的见解会更符合《纽约时报》的社论,而不是迎合那些来自《华尔街日报》的文章。我对那些始终偏袒有钱有势者,却声称政府为所有人创造了机会的政策感到愤慨。我相信进化论,相信科学研究和全球变暖。不管政治上正确与否,我坚信自由演讲的权利。我对那些利用政府把个人宗教信仰(包括我自己的)强加给他人的做法表示怀疑。还有,我无法摆脱自著自书的局限,因为我不得不透过一个混血黑人的镜头去审视美国历史。我永远不会忘记历代和我一样的人们是如何受到压迫和蔑视的,永远不会忽略种族和阶级仍旧继续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不管其明显与否。

但以上这些并非我的全部。我也想过我的党派可能有时也会自以为是、孤立或者教条主义。我相信自由市场,相信公平竞争和企业家,我认为许多政府计划都没有像宣传的那样开展。我希望这个国家少一些律师,多一些工程师。我认为美国需要在世界上更多地伸张正义。对于敌人,我很少寄予幻想;对于我们军官的胆略和勇气,我感到由衷的敬佩。对于那些以种族和性别歧视为基础,追求性并无视受害者的政策,我一概拒绝。我认为城市中心的苦恼大部分来自于文化上的衰落,这是无法单纯用金钱治愈的,价值观和精神生活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国内生产总值。

11

毫无疑问,我的一些观点肯定会给我带来麻烦。在国内政坛,我不过是一位刚刚出道者而已,所以,必然会招来各政派人士的议论。这样,我也必然会让其中一部分人(即便不是所有人)感到失望。可能这就表明了本书第二个更私人化的主题:我或者任何一位公众人物如何才能避免掉进追求名利、渴望奉承、惧怕失败的陷阱,从而保住那份真理的精髓,保持住我们每个人心中的独特的声音,这个声音时刻提醒着我们最坚定的承诺。

最近,一位负责国会山(Capitol Hill)报道的记者在我去办公室的途中拦住了我,她说很喜欢我的第一本书。“我在想,”她说,“你的下一部书还能这么有趣吗?”其实她的意思是说,既然你已是联邦参议员了,我怀疑你还能如此诚实吗?

有时候我也很怀疑。希望我能在这本书的写作中找到答案。

第一章

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

一般情况下,我乘地下交通进入国会山。一列小小的地铁从我办公室所在地哈特大楼开出,在上面可以看到沿途隧道里满是五十个州的旗帜和徽章。列车吱嘎一声停住,我踏出车厢,从忙碌的雇员、车站维护工人、偶尔可见的旅游团队中间穿过,然后搭上一间老旧的电梯升到二楼。走出电梯,通常可以发现拥挤在这里的新闻记者。我从中挤出一条路,冲着值班的首府警卫打一声招呼,然后再穿过两扇庄严厚实的大门,就来到了合众国参议院的办公所在地。 13

参议院并不是国会山最赏心悦目的地方,但能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暗褐色的墙壁衬托出蓝条纹的镶板和条纹精美的大理石柱。头顶上高悬一个乳白色的圆形穹顶,在穹顶正中,雕刻着一只美利坚雄鹰。在供游客参观的走廊之上,安详而庄严地陈列着美国历史上前二十位副总统的半身雕像。

徐徐前行,可以看到参议院的席位由一百张桃花心木桌子呈马蹄铁形排成四行。每张桌子的上方都摆放有墨水瓶和鹅毛笔,有些桌子的历史甚至能追溯到1819年。随便打开一个抽屉,你就能发现曾经使用过这张桌子的参议员名字——塔夫特(Taft)、隆(Long)、斯登尼斯(Stennis)、肯尼迪(Kennedy),而且这些或潦草或工整的字迹皆出自于议员们之手。有时,站在参议院议事厅中,我可以想象保尔·道格拉斯(Paul Douglas)或者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坐在其中的一张桌子前,再一次敦促议会采纳和通过民权法案;或者是在几张桌子开外,乔·麦卡锡(Joe McCarthy)正在翻阅着长长的名单,随时准备为其中的一些名字作政治定性;或者是林登·约翰逊(LBJ),徘徊在过道上,通过游说来拉选票。有时,我也会徘徊在 14

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曾经用过的桌子边,想象着他勇敢地站出来,挺立在挤得水泄不通的议会旁听席和同僚们面前,强烈反对分裂势力,奋力维护联邦的完整。他的眼中闪烁着熊熊的火光。

但是这种想象不会持续很久。除了投票的短短几分钟,我和同僚们并不会在议事厅待太长时间。绝大多数的决定——包括提出什么法案,什么时候提出法案,需要做什么修正以及如何劝导反对派议员参与合作——早已被多数党领袖与相关的委员会主席,还有他们的同僚,甚至(这还取决于反对的程度和处理提案的共和党人的思想境界)在野民主党人士讨论决定了。当我们来到议会厅时,秘书便开始点名,参议员按序投票。其实他们都已拿定了主意——他们和同僚磋商,考量政党会议领导、院外游说团、利益集团、选民来信,以及意识形态的倾向等因素——在具体议题上早已确定了自己的立场。

这样的安排有助于提高办事的效率,自然得到那些疲于奔命的议员们的高度认可。他们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往往长达十二甚至十三个小时:他们得急忙赶回办公室与委托人见面,回复电话,还要去附近的饭店结交政治捐助者,甚至还要赶去电视台直播室做现场访谈。如果你更加留心的话,你有可能发现在众人离去后,仍然有一个孤独的议员伫立在办公桌前,苦苦思索提案如何能得到认可从而在议会上发表演说。这可能是一份提案的解释,也可能是一份有关国内新问题的全面评述。演讲者充满激情,声音慷慨激昂;他的论点——关于削减低收入家庭的福利计划,或者关于阻挠一项司法任命,或者关于能源独立的必要性——听起来也是有理有据。但是这位讲演者也只能面对几乎是空荡的议会大厅发表演说,参与者只有会议主持人,少数议会同僚,参议院主席,还有那些目不转睛的美国有线频道(C-SPAN)的摄影记者。讲演结束时,讲演材料会被一位身着蓝色制服的书记员悄悄收去,作为官方的记录而保留。当这位议员走下台时,另一位议员会走到演讲席前,发表演讲,并希望得到广泛的认可。就这样,她重复前者所做的事情,一切都按部就班地进行。

就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审议机构里面,没有一个人在倾听。

我还记得2005年的1月4日。就在这一天,我和另外三分之一的参议员宣誓就任为第一百零九届国会的议员。那真是一段美丽而模糊的回忆。

阳光明媚,气温也反常的温暖。家人和朋友们从伊利诺伊、夏威夷、伦敦、肯尼亚专程赶来参加我的就职仪式。当我和新当选的同僚们站在议会厅大理石讲台前,举起右手做就职宣誓的时候,他们都为我欢呼雀跃。在那古老的参议院议事厅里,我和妻子米歇尔(Michelle),还有我的两个女儿再次重温了仪式的过程并同副总统切尼合影留念(不出所料,六岁的玛丽亚很娴静地握着副总统的手,而三岁的萨莎[Sasha]却是先与副总统击掌,然后快速转过身来,面对着镜头招手)。之后,我就目视着女儿们蹦蹦跳跳,跑下国会大厦东面的台阶,她们的红色和粉色裙子随风优雅地摆动,最高法院外的白色廊柱成了她们嬉戏的庄严背景。米歇尔和我牵着她们俩的手,四人一起走到国会图书馆,在那里我们遇到了数百名祝福者,他们是冲着这一天从外地赶来的,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大家互相握手、拥抱、拍照、签名留念。

一整天不停的微笑和致谢,一整天的礼仪和庆典——这就是国会山来宾的感受。也许那天是整个华盛顿特区最优雅的日子,人们都暂时停下来,集体欢呼我们的民主在继续。但是,此时的空气中却弥漫着一种滞息,提醒着人们此景不会持续很久。当招待会告一段落,家人和朋友们都离去以后,冬日的夕阳无力地落进铅灰色的暮霭之中,此时,游离在这个城市上空的阴影是这样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这个国家被分裂,华盛顿被分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这种政治上的分裂愈演愈烈。

16

我们的总统大选和各种各样的数据统计无不在表明我们传统智慧的正确。但美国在一系列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出兵伊拉克、征税、堕胎、枪械管制、“十诫”、同性婚姻、移民、自由贸易、教育政策、环境的规范治理、政府组织的规模、法院的地位。我们不仅存在分歧,而且还带着分裂的和放纵的党派偏见,甚至不惜将最刻薄的批评抛向对手。我们在分歧的范围上存在分歧,在分歧的性质方面存在分歧,在分歧的理由上存在分歧。一切都充满了分歧:不管是造成气候改变的原因还是气候改变这个事实本身,不管是赤字的规模还是产生赤字的原因。

对我而言,这些都算不上新鲜事。长久以来,我一直关注逐步升级的华盛顿的政治争斗:伊朗门(Iran-Contra)和奥利·诺思(Ollie North)事件,博克(Bork)提名和威利·霍顿(Willie Horton)事件,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和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的听证会,克林顿(Clinton)选举和金里奇革命(Gingrich Revolution),白水事件(Whitewater)和斯塔尔调查报告

(Starr investigation), 政府部门消极怠工而弹劾声却不绝于耳, 悬而不决的扯皮(dangling chads)和布什戈尔之争。与其他公众一道, 我见证了竞选文化渗透于整个政体内部, 它作为一个极尽侮辱与诽谤之能事的产业, 一个长期繁荣且有利可图的产业而占据了有线电视, 无线广播和《纽约时报》畅销书的排行榜。

17 在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任职的八年中, 我渐渐地掌握了这种政治游戏的一些规则。在我 1997 年来到斯普林菲尔德(Springfield)上任时, 伊利诺伊州参议院中占据多数席位的共和党采纳了和众议院议长金里奇控制美国众议院如出一辙的做法。在根本无力对修正案提出讨论, 更遑论提案得到通过的情形下, 民主党议员在一旁束手无策, 只会抱怨和指责, 但是这根本于事无补。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共和党通过了大型企业税收优惠提案, 将经济压力转嫁给工人, 甚至还削减了社会服务。一股愤怒的情绪在民主党会议上蔓延。此后, 同僚们开始仔细地记录下大佬党(GOP)对权力的滥用, 哪怕是一次细微的滥用也绝不放过。六年后, 民主党当政, 大佬党的日子也变得艰难。这时, 一些老议员们不禁怀念起当年共和党和民主党一起共度晚餐, 在牛排和雪茄的香味中商讨双方都能妥协的方案的情景。遗憾的是, 当这些老人成为对方恶意中伤的目标, 面对自己的选区大量散发的诸如渎职、腐败、无能和道德败坏的诬陷邮件时, 过去那些温馨的回忆也会消失殆尽, 荡然无存。

我并没有选择在这一切中做一个袖手旁观者。在我的理解中, 政治就是一项身体对抗激烈的体育运动, 即使是横眉瞪眼和偶尔脚下使绊儿也不会被判犯规。但由于占据了一个民主党占绝对优势的选区, 我终于逃脱了被共和党成员大声唾骂的命运。偶尔, 我也会和最保守的同僚一起共同起草一份法案, 然后仅仅通过一圈扑克牌或者是一杯啤酒, 我们就会发现彼此之间有着不愿公开承认的更多的共同之处。这也许就能解释为什么在斯普林菲尔德的这些年里, 我会一直坚持着这么一种信念, 那就是政治也可以是另外一种样子。选民们希望能看到不同的东西: 他们已经厌倦曲解事实, 诋毁谩骂, 厌倦通过电视辩论来解决复杂的政治问题。如果我能和那些选民直接交流, 感觉到他们的心声, 并将他们的选择尽可能忠实地传达出来, 那么, 渴望公平竞争的本能和常识就能使他们重新振作起来。如果我们中有
18 足够多的人愿意冒这个风险的话, 那么, 不仅国家的政治, 甚至国家政策也